

## 第六章 流浪的日子

Jwlu

回到乡下家里以后，饭也吃不饱，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劳动。最伤脑筋的是被人看不起，说是从学校里赶回来的地主崽子。从来没有在稻田里劳动过的我什么也做不得，才拿一天锄头手上就起了几个血泡，箢箕扁担一放到肩上就伸不得腰，晒几天太阳脸上就脱了一层皮。

在田里中耕禾苗，本来是要把田里的杂草踩到泥巴里，我的脚不灵活，有时会把禾苗也踩到泥巴里去了。这时素有积极分子之称的言一阿婆，冷不防一棍子打到我的脚杆上，真是钻心的痛。她打了我一棍子还骂：“地主崽子，读书读蠢了？”我含着眼泪不敢作声。本来失学就让我痛苦不已，加上地主崽子的帽子，真是感到眼前一遍漆黑。

开始在生产队出工，一天累得筋疲力尽，我还只能记三分工，等于一角钱的报酬。而且生活越来越苦，每天吃的是红薯，菜里面一点儿油星子也没有。肚子里觉得从来没吃过东面一样。有时候饿极了，晚上跑到稻田里偷一把红花草，用清水煮一下就吃。红花草是田里种植了做绿肥用的，吃了以后肚子长泻不止。白天手脚在做事，心里时刻是想到哪里去搞点吃的。菜根、薺子草、麻菟子都挖来吃，吃得肚子实在涨得不行了，心里还想吃。下雨天生产队若是不出工，队里一些人就到坝边上水沟里去挖黄鳝泥鳅，挖回来放到火上烧一烧就吃。队上所有的人都饿得黄皮刮瘦，大半人都患了水肿病。我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

\* \* \* \* \*

我的四哥鲁益民由于工厂停产从常德棉纺厂下放到了西洞庭湖农场。那是国营农场，想必情况要比生产队好得多，我就写信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四哥回信说，硬是饿得不行就来我这里住一段时间吧。我接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动身，步行六十里走到坪塘，再坐汽划子到长沙，买了当晚去西洞庭湖农场的船票。

我所带的钱和粮票只够乘船到离农场还有五十里远的蒿子港镇。我到蒿子港下船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还是在轮船上吃了早饭的，没钱搭车更没钱吃饭。我一边走一边问路，到天黑也饿得走不动了。那是六月的天气，湖区的蚊子特别多，一坐下来歇脚，一群群的蚊子围着咬，只得站起来继续走。走了不到一里路再也不想走了，就在路边一处菜地坐下来。当时我想菜地可能也有什么菜可生吃的，便在土里乱摸，突然发现有很多菜瓜藤，顺藤摸去摘了个很大的菜瓜，一阵欢喜，连忙用手擦掉那瓜上的泥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到农场好在是一条公路，黑夜里不用问路，走到半夜终于到了一分场。找到四哥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四哥见我还未吃晚饭，半夜里把煮饭的师傅叫醒，弄来了一大碗饭菜。他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着饭，一身破烂的衣服连连叹息。吃完饭以后他找来自己的衣服让我洗澡换上才睡。

这西洞庭湖农场是国营的，虽然和我们生产队一样种水稻、棉花，但是那里的职工每人每月有四十五斤大米供应，每月还发二十八元工资。我当时也羡慕那个地方的。一望无边的平原，大型拖拉机耕地，运输物资都是汽车，基本上是机械化。农场里种的一半是水稻，一半是棉花，还有一大片莲子湖。四哥的任务是守莲子。我每天跟他到湖边的棚子里去玩。尽管无边碧绿的荷叶、粉红的莲花、荷叶底下藏着鲜嫩的莲子、还有水渠里一群群的鱼虾，我什么兴趣也没有。一天到晚忧心沉沉，我总觉得这是在逃荒，时刻感到前途渺茫。四哥虽然自己也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可他却还不时劝我心情要放开朗些，十几岁人不要把身体愁坏了。

我到农场后，四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那些同事们筹措饭票。农场的工友们见我饿得刮瘦，非常同情，你三斤他五斤送过来，几天时间居然凑了五十斤饭票。五十斤饭票就是五十斤大米，当时每斤米能卖三块钱。我在西洞庭湖呆了四十天，总算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 \* \* \* \*

那年，也就是六二年，由于我没有在生产队出什么工，秋后我只分得两百多斤稻谷，更不要说什么钱了。虽然和二哥、三哥生活在一起，总觉得要自食其力好。过了年我便瞒着生产队和邻队的两个青年一起外出（那时叫外流），到临湘城陵矶去做红砖坯子。当时的报酬是红砖坯子全干后装窑点数，做满一万块有一十五斤大米和二十元钱。我们住在一个芦柴棚子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饭吃完就干活，中午从不休息，一直做到天黑，晚上还要把那些砖坯子盖好。十多天时间下来，我从没做过砖

的也做了一万多块。其他两个年纪大又做过砖的当然比我做得多。我望着一排排整齐的砖块很高兴，心想照这样做下去，一个月也能挣六十多元钱，几十斤大米。谁料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雨，我们辛辛苦苦做的那些砖坯子成一堆堆的泥巴。望着那些泥巴，欲哭无泪，白忙了那些日夜！

春天的雨水特别多，做砖这种活不能再干了。我们打听到湖北监利县的长航农场需要人担堤护坡，于是又卷起行李从城临矶坐火车到岳阳，再从岳阳乘轮船到了那个农场。找到场部一问，确实需要劳动力，我们做砖的伙计一同来的有十几个人立刻报名办好手续。当即就领到了一百斤米和五十元钱的生活费，还有一口大铁锅和一些工具，住在长江岸边一所小学校里。这学校里住满了民工，大概有几百人，都是外地来谋生的人。

管理我们的人是农场的治安主任叫米志明，五十多岁，一脸的官架子气态。当我们吃完晚饭坐在芦苇铺的地铺上休息时，这位主任拿着一个册子重新登记，他说要老实填报自己的家庭地址和阶级成份，这里是不收地主富农的。我们这些人都胡乱编了姓名和地址，都是贫下中农。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米主任带我们沿长江大堤走了里多路便到了工地。那是一大遍荒湖沼泽地，要用土堤围起来变成水田种水稻。大堤的规划已经用草绳子和竹杆架了个样，二十几米宽下基脚，五米多高，要全靠人工垒起来。米主任给我们划了五十米长的任务，说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大家马上动手干起来，挖的挖，挑的挑。一连干了几天，我们的情绪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工地上规定干两小时休息十几分钟，可是我们不休息，中午也吃了饭就做事。管理员早上带队出工，晚上收工时点名。六十年代初，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都跑出来混饭吃的。到这里来做事的人越来越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工地上也搭起了很多芦柴棚子，

当我们干到第十天时，农场工地指挥部来丈量新堤土方，量了我们担的土方还不足两百立方米。按农场的报酬每立方米土方只有半斤米指标和三角钱，而我们十天时间已吃了一百五十斤米，伙食费也借了八十元钱。晚上大家坐下来一议论，觉得在这里干养不活自己。听说湖北洪湖那边也是担堤，每立方土还有五角钱的报酬。于是决定另找别处，当即算了伙食账，所领的八十元钱除去伙食费，每人分了二元八角钱。晚上九点多钟趁那个米主任睡觉去了，我们卷起行李连农场发的锄头簸箕也一并带上，一行人悄悄地走出了学校。

本来附近就有长江的渡口，但是我们不敢在那里找船渡江，生怕农场的人追来，只得沿着长江往下走。走了没多久，天一下子墨黑墨黑的，连路也看不清了，远处响起了沉闷的雷声，接着又刮起了大风。眼看就有一场暴雨要来了，我们急忙向堤下面的村子走。那村子的房屋都是连起来的成了一条街。等我们刚进村，狂风夹着豆大的暴雨横扫过来。风就象要把房屋掀翻一样，行人站也站不稳。大家急忙去叫门躲雨，这时村里的人都已经睡了，没有灯火的人家敲门根本没人理，可是有灯光的人家也不开门。情急之下只好用锄头打门了，当一个人家开门时看到这么多人，那门一下子又关上了。再敲，当第二家开门时我们有人用扁担插进门缝里不让关了。大伙一拥而进，这时每个人都已被雨淋了个透湿。三月气温还很低，被雨淋湿以后冷得人直打颤。这位好心的房东见我们这些做工的人那个狼狈样子，连忙搬来一些芦苇烧火给我们烤。烤干衣服以后，我们就在堂屋里的地上铺开被子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其他伙计要到洪湖农场去，只有我和同村一路来的张某某不愿意去。那位房东告诉我们，离村子五十里远渡过长江就是湖南的君山农场，那里旱土改水田正需要劳动力。于是，我们决定去试试。打扰了房主人一夜，又烧了他家很多柴火，大家商量把从长航农场带来的那些工具给他作酬谢。

\* \* \* \* \*

与那些伙计告别后，我们两人沿着长江往上走，已经到了中午时光了，还没有吃早饭。两人仅有五元六角钱和三斤全国粮票。沿途又没有饭店，只好到民户人家去买吃的。一连问了好几家，看见他们刚吃完中饭有剩的也不卖给我们。

人一饿了就没有一点力气，路也不想走了，看见路边一家代销店便也进去坐一下弄碗水喝。突然听得店里的女主人讲的是湖南宁乡话，我们马上跟她答腔。她一听说我们是宁乡人，立刻热情起来，还泡了两杯热茶给我们。交谈了一阵之后，知道她是宁乡沩山的，那里也是一个穷乡僻壤，山多田少，以红薯杂粮为食，通过亲戚介绍嫁到湖北来的。最后我说：“我们今天还没有吃早饭，想要跟老家乡里买点饭吃。”他们夫妇马上答应说：“我们才吃过，还有一些饭菜是热的，你们只管吃就是。”我们俩人已经几餐没吃饭了，那饭扒到口里还没嚼就吞下去了，一连吃了几碗。几分钟的时间把他们一大盆饭都吃光了。吃完饭后，我拿出一斤粮票和五角钱交给他们，那店老板连说：“不要钱粮，你们是我老婆的乡亲，难得来的嘛。”我们还是把钱和粮票放在桌子上才告别出门。

不知我们走了多少路，等走到君山农场对岸时，天已经黑了，江面上风又大，摆渡的人不开船了，只得到渡口的饭店去住。我们没有钱，跟店主人说用自己的被子铺在地上睡一晚得收多少钱，“便宜你们就收八角钱算了，”老板娘在旁边说。我顺便就交给她八角钱。她把我们安排在厨房的柴角地上睡。我们走了一天实在累了，晚饭也没吃铺开被子就睡了。天刚蒙蒙亮就被江边驾渡船的人喊醒，我们急忙收拾好行李走出门去。这时店老板追出门来挡着我交少了住宿费。我说：“昨晚不是已经交给老板娘了吗？”他说：“你交八角钱那只是一个人的，你们两个人还得再交八角钱。”我说：“我们实在是没有钱了，请你原谅吧。”姓张的伙计不理他径直向江边的渡船走去。我却被那店老板一把拖住硬要钱。这时驾渡船的人在大声喊：“开船了！”我一听着急了又向老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是拖住不放。最后我说给你这根担行李的扁担如何。他见那根扁担是茶子树做的，在湖区难买到，多少能值一点钱，才放了我。

\* \* \* \* \*

渡江的船也等了我们好久才开船。那渡船是一只小划子。几里路宽的江面上无风都有三尺浪，六七个人坐在那个划子上就象一片树叶在浪头上飘，船边离水不到三寸高，浪花不时打到人身了，吓死人。我从未坐过摆渡，觉得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两手牢牢地抓紧船边。

那船划了两个多钟头才到长江对岸。过江以后我们走到君山农场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还是先天中午吃了餐饭的，已经饿极了，看见路边田里有很多萝卜，每个人立刻扯了两个洗干净坐在地上吃起来。人一饿了生萝卜吃起来也胜过吃山珍海味，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得肚子都鼓起来了还想吃。吃饱以后又歇了一阵才起身朝有房子的地方走去，只要看见人我们就上前去打听农场哪个队要人。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只告诉我们去找场部。可是找了场部一问还是要找队上，找来找去已经过了晌午。人又饿得走不动了。这时候天又下起了大雨，那湖区的土地本来是湖泥淤积而成的，路上没有一粒砂子，雨水一淋滑得象沾了油似的，走一步滑一步，两个人都连摔几跤滚了一身的泥巴。等到我们赶到有人家的地方躲雨时已经淋得透湿，早春的气温本来不高，淋湿了以后站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又饿又冷。

屋里的女主人见我们站在门外又被雨淋湿了，叫我们进屋里坐，倒了杯热开水给我们问我们是那里人，到这里来做什么的。我立刻向她讲明，我们是湖南宁乡人，听说君山农场招工，到这里来找工作的。她说：“我男人是这个队上的会计，等会儿回来问他，看队上要人不。”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一个身上披着稻草蓑衣，手里拿一把铁锹的中年人朝这个屋走来。我们看他进门知道是屋里的主人便起身向他点头打招呼，他连忙说坐吧。他老婆马上向他讲了我们是来找事做的。他放下手里的东西，还没落坐，只在茶壶里倒了杯水喝了之后，就说：“你们跟我到队长那里去看看吧。”

他把我们带到一家人家在门外，就大声喊，邓队长在家不。从屋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嘴里刁着一支烟的人，只听他答应：“刘会计什么子事？”刘会计说：“我们队上不是要招人吗？这里来了两个人你看要得不。”那位邓队长马上热情的让我们进屋坐，并问我们在家里是不是种田的，姓张的伙计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专门种的水稻，犁田耙田插秧等这些活我们都里手。”谈了一阵之后，队长和会计决定留下我们，并且说好报酬是每月做满二十六天工作日，工资二十八元和四十五斤粮食指标。谈妥这些以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我说我们今天还没有吃饭呢。邓队长立刻从碗柜子里端出一大盆子小米和小米煮的饭，他说：“放到锅里热一下吧，”我们连忙说：“不必要了。”那一盆饭足有两斤米，一碗腊八豆，一碗油菜苔我们两个人是连味都没有吃出来就一下子狼吞虎咽的吃到了肚子里。吃完饭以后，我们又回到刘会计家里办登记手续，在招工表上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和文化程度。在填到阶级成份这一栏时，我把成份写成了中农。我明白自己出身不好走到哪里都会受歧视。

队上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粮油证及一本考勤证，每人借支二十元钱作伙食费。住在队上的一间保管室里。我们开好铺以后去附近粮店买了米和食油，在代销店买了盐、碗筷和一口小铁锅。回房时，队长又来对我们说，煮饭要烧的柴你们就用队上的防洪芦苇，至于蔬菜，田地里到处是油菜秧子和萝卜，你们去弄就是。劳累奔波了几天，这天晚上我们自己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餐，晚饭后舒舒服服一觉睡到天明。

第二天出工时姓张的被安排去犁田，我和大伙一起去平整水田。下午刘会计叫我和他一起去丈量水田丘块面积，他跟我谈得来，他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却到外面来混。我说家里困难读不起书，特别是现在，连饭都没有吃。他告诉我说：“我就是有书读不进，只上了小学就不想读书了，来农场已经好几年了。”丈量时，他见我的字写得好便要我作记录，他去牵皮尺。我在那里干了几天以后了解到那些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地来的，而正式职工只有少数，不过在农场干得久了可以转为正式职工。所有来农场做工的人都认为那儿要比自己家乡好，起码有饭吃，还能每月拿几十元工资。

君山农场下水田劳动时比家里生产队出工多一道手续，每天出工时有个卫生员提着一个白色的桶子，里面装着白色象油一样的药液，每个人必须用它涂在脚杆上，防血吸虫病。我初到那里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十几天以后才发觉有很多人不论男女，其中也有十几岁的姑娘都挺着个大肚子，而且面黄肌瘦，原来这些人就是血吸虫病患者。据说，得了这种病的人严重的会丧失劳动力，终身难治，尤其是女子还不能生育，甚是可怕。

\* \* \* \* \*

虽然搞劳动生产并不太累，粮食也够吃的，每月还能领一些工资，比起在家里的生产队出工强多了，但是一看到那些患血吸虫病的人心就不安起来。怎么办呢，我们两人商量要去找一个不下水的事情做。正好那天下大雨不能出工，我们沿着公路往总场方向去，走了一点多钟在路边看见几个放养群鸭的人，便走过去跟他们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有两家正要请人放鸭，待遇是吃他们的，每月工资三十元。我们双方议定先做两天试试，答应第二天就去上工。

回到队上我们跟队长请两天假，说是有亲戚在岳阳城里要去走一趟，队长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了七八里路到鸭老板那里去做事。姓张的伙计找的那个老板姓苏，带他走了。我找的老板姓杨，五十多岁人，看样子很和气。

吃完早饭以后，杨老板交给我一担粪桶子，要我到各家各户的厕所里去捞粪蛆担回去喂小鸭子。那地方每家的茅厕就是用芦苇围起来就地挖个坑，我挑着那担桶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寻了这个粪坑又找那个粪坑。粪坑里头苍蝇成群，蛆婆子直翻，臭气熏人让人看了就恶心，闻了就要呕。我用一个小尼龙网子把蛆婆子滔上来放到水里洗洗再倒进桶子里，每倒一次就呕吐一次难受极了。我走了七八家人家的茅厕实在受不了了，把粪桶子放在远处找了个树阴下坐那里不干了。心想这哪里是人干的事啊，要不是我父亲他们留下那么多财产成了地主，凭我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后也一定能考取高中，或者也进了工厂，不晓得前世作了么子孽如今要来受这个苦。想来又觉得这闷气生得太可笑了，这人生在世，哪朝哪代谁不想升官发财，谁不想出人头地，这又怎能怪父亲呢，怪只怪自己生不逢时罢了。我一直坐到中午的时候，才担着那粪桶子回到鸭棚里。杨老板见我捞的蛆婆子不足四五斤很不满意地说，“一天要捞三十斤才够小鸭子吃的，你半天至少也要搞它十多斤。”我推托说，“路不熟走了很多弯路。”

吃完中饭后，老板叫我和他一同去放鸭子。大约有两千多只小鸭子就放在附近的湖里，那湖一边是水一边是荷叶，他坐在岸边，要我架一条小船到湖中间荷叶边去守着，不能让小鸭子钻进荷叶丛中去，否则会走散丢失。我从来没有划过船，那条船也只不过澡盆大不了多少，我一站上去它就往一边侧。我不敢伸腰，只得一屁股坐在有一层水的船仓里，手里拿一根竹杆去划，可是那船不听我的使唤，只要一划水小船就打转转。不知费了好多力气，全身汗透了才把船划到湖中间。当我看到有几只小鸭子就要钻进荷叶丛时便想划过去赶，谁料一用力那船一侧，我却扑通一下子掉进了水里。幸好我会游水。我浮在水面推着小船划到岸边，把打湿了的衣服凉在草地上晒着。杨老板看着我直发笑。我好不容易才干完了这天放鸭的工作。

等到吃了晚饭，天已经黑了好久。晚上就安排我守鸭子，并答应每月给我加六块钱的工资。睡在露天的竹板子上，成群的蚊子围着我咬，小鸭子不停的叫唤，一股股的鸭屎臭气熏得我抽不过气来，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心想这人活在世上要搞一碗饭吃真是太难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没合一下眼，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对杨老板说，“这活我实在是干不下，我要走。”他再三挽留说，“你干几天就习惯了，你若继续做的话，我还可以再加几块钱一月，你考虑一下吧。”但是我坚决要走。老板无奈，从口袋里掏出一元二角钱来，并说你吃了早饭再走吧。我接过那一元二角钱说道：“谢谢你，早饭就不吃了。”便匆匆离开了那个鸭棚子。

\* \* \* \* \*

我一口气跑回农场，就跟农场的那些伙计们一起去插秧苗。插秧可是我的拿手戏，我比谁都插得快。队长还说以后每月要给我加两块钱工资。和我一起去看鸭的伙计在那家放了三天鸭子也回农场来了。他说看鸭的那碗饭难得吃，还是农场好。我们和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天天在一起，一看到他们就使我没有长期在这里的打算，但是一想到家里的生产队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钱还不到三角钱，又顾不得什么了，心想权且在这里呆上几个月再说吧。几个月来我们在那里已经混是很熟了，特别是队上的领导也很喜欢我们，白天和大家一起做事觉得不累，晚上又很多人聊天也感到痛快。可是，没多久农场却来了一场政治运动，要求外地来的人员务必在半个月内从自己家里的大队上打个证明来，特别是强调阶级成份要写清楚。我想一来是瞒着生产队出来的，二是自己是地主成份没有政治自由，走到那里都低

人一等，没有办法，只好打算回家。恰好一同外出的张某某快三十岁了还未成家，他也打算回家找对象，于是两人都去找队上辞工结账回到了家里。